

從門羅主義到“唐羅主義”：
特朗普第二任期西半球戰略的邏輯及其秩序影響

巴殿君*, 孫佳楠**

목 차	
一、問題的提出	五、國際秩序后果
二、概念界定與理論框架	六、“唐羅主義”的外部回應
三、“唐羅主義”的三重驅動力	七、結論
四、“唐羅主義”的邏輯悖論	

| 논문요약 |

2026年1月，美國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行動并拘捕馬杜羅，使門羅主義傳統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被重新激活。本文將這一政策取向概括為“唐羅主義”，并在防御性修正主義和勢力範圍政治的框架下分析其生成邏輯。文章認為，“唐羅主義”并非美國霸權自信擴張的簡單表現，而是相對優勢收縮、國內政治動員和西半球排他性安全觀共同作用的結果。其邏輯悖論在于，美國試圖通過恢夏地區控制能力來延緩霸權衰退，却可能削弱其長期依賴的規則合法性，并刺激國際體系向更具排他性、等級性和碎片化的方向演化。本文基于已經發生的政策事實與政策數據展開對“唐羅主義”的實証性分析。“唐羅主義”顯示出美國西半球政策中實力政治邏輯上升的趨勢，但這一趨勢能否導致全球秩序整体轉向，仍取決于其他大國反應、盟友態度和多邊制度的約束能力。

▪ 關鍵詞：美國；門羅主義；霸權擴張；唐羅主義；修正主義

* 第一作者：吉林大學 東北亞研究中心 副主任，教授
** 共同作者：吉林大學 東北亞學院 博士研究生

一. 問題的提出：從馬杜羅事件到“唐羅主義”

2026年1月3日凌晨，美國實施了拘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¹⁾特种軍事作戰行動。該行動被視為對二戰結束以來逐漸形成并广泛接受的國際法秩序的一次重大沖擊，其所體現的單邊軍事干預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以國家主權原則和國際規則體系為基礎的戰后國際規範框架。據美方公開表述，2026年1月3日，美國軍方與執法機構在加拉加斯實施軍事行動，拘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及其妻子，并將其轉移至美國司法體系處理。馬杜羅最終仍被移交至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并被指控涉嫌參與“麻醉品恐怖主義”相關犯罪活動。關於此次的行動規模、參與單位和人員傷亡情況，不同媒體報道存在差異，本文不展開戰術細節，而主要關注該行動所體現的戰略邏輯與規範後果。

盡管特朗普政府將此次軍事行動包裝為針對所謂“在逃嫌犯”的司法執行措施，但從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視角觀察，該事件實際上反映出美國國家戰略方向正在發生深層調整。2025年11月，美國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并在其中提出基於傳統“門羅主義”的新型戰略闡釋。2025年12月2日，白宮以特朗普的名義發布《門羅宣言紀念日的美國總統聲明》。²⁾這一政策取向在官方文件中更接近“特朗普版門羅主義推論”，而在媒體和政策評論中則被稱為“Donroe Doctrine”。這一表述，并將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優位、限制非西半球競爭者在地區部署威脅性能力或控制戰略資產、確保美國進入關鍵戰略地點等目標納入同一政策框架。³⁾本文沿用“唐羅主義”作為分析性稱謂，主要指特朗普第二任期圍繞上述“特朗普推論”形成的西半球政策組合。“特朗普推論”屬於美國政府正式政策用語，“唐羅主義”屬於本文對相關政策實踐的概括性表

1) Kingsley O. Asomugha, Esq. (2026). Irony of the Equality of States: American 2026 Action in Venezuela, 13(1), <https://doi.org/10.51244/IJRSI.2026.13010166>.

2) The White House, “America 250: Presidential Message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December 2,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12/america-250-presidential-message-on-the-anniversary-of-the-monroe-doctrine/>.

3) The White House. 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達。對於如何落實“唐羅主義”，在同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在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聯合與拓展兩大路徑：推動西半球國家在經濟合作、移民治理以及地區安全等領域進一步配合美國的戰略安排；同時，通過擴大美國主導的區域合作網絡，將更多拉美及加勒比國家納入其戰略影響體系之中，以削弱競爭性力量在西半球關鍵戰略資源、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全球供應鏈環節中的參與程度和影響能力。⁴⁾

與其將“唐羅主義”視為嚴格意義上的官方文件，不如將其理解為特朗普第二任期西半球政策中“門羅主義回歸—特朗普推論—強制性地區控制”三者結合的政治敘事。“唐羅主義”相較於傳統的門羅主義而言，其核心主張在於重新強調美國對西半球事務的主導權。正如特朗普在關公開講話中所表達的觀點，“門羅主義已經重新回歸”，當西半球國家的政治危機或內部失序被認定可能危及美國區域安全利益時，美國政府有權採取超越傳統主權邊界的干預措施。⁵⁾從政策實踐角度來看，“唐羅主義”並非停留於意識形態層面的政治宣示，而是具有明確戰略指向和現實行動邏輯的政策框架。該理念意味著美國外交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二戰後國際秩序中關於國家主權平等與禁止單方面使用武力改變他國政治進程的基本規範，尤其與《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確立的國際法原則存在張力。從拘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到圍繞格陵蘭島、加拿大以及巴拿馬運河等問題釋放領土與控制意圖，再到針對哥倫比亞和古巴政治領導層採取高壓威懾策略，一系列行動均顯示，美國正在形成一種以軍事優勢和強制性手段為支撐、旨在強化西半球控制能力的新型霸權戰略。

基於此，本文將圍繞“唐羅主義”與傳統門羅主義有何連續與變化，美國為何在霸權相對優勢收縮背景下選擇強化西半球控制，以及這種政策邏輯對國際體系演變影響展開系統研究。“唐羅主義”不是傳統門羅主義的簡單復活，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在霸權焦慮、國內政治動員和大國競爭壓力下形成的西半球強制性控制敘事。它以國家安全、反毒、反域外力量滲透和資源安全為正當化理由，試圖恢復美國對西半球的排他性影響力。其邏輯悖論在於，美國為維護霸

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5) 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B/OL]. The White House, 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權而突破規則，却可能削弱其霸權合法性；為恢復地區秩序而強化強制控制，却可能刺激拉美反美情緒和其他大國的勢力範圍主張；為延緩相對衰落而重塑門羅主義，却可能加速規則基礎秩序的碎片化。

二．概念界定与理論框架：防御性修正主義、霸權焦慮与勢力範圍政治

1. 門羅主義、羅斯福推論与美國西半球秩序觀

門羅主義需要置于美國西半球戰略的歷史演變中加以理解。1823年12月2日，詹姆斯·門羅在向國會提交的第七次年度咨文中提出，美洲大陸基于其已經取得并維持的自由与獨立，不應再成為歐洲列強未來殖民的對象；對於歐洲列強試圖壓迫已經獨立的美洲國家或控制其命運的行為，美國將視其為對自身和平与安全具有影響的政治行動。⁶⁾同時，門羅政府繼續強調美國不介入歐洲國家既有戰爭与內部事務。后世通常据此概括出反對歐洲進一步殖民、反對歐洲政治干涉以及區分美歐政治空間等基本原則。這一時期美國的物質能力仍然有限，門羅主義首先體現為針對歐洲列強的戰略宣示，并逐漸形成美國對西半球具有特殊安全利益的空間觀念。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經濟与軍事實力增長，西半球政策開始具有更強的干預色彩。1902年至1903年的委內瑞拉債務危機強化了美國決策層對歐洲列強以債務追索為由介入拉美事務的擔憂。1904年12月6日，西奧多·羅斯福在年度咨文中對門羅主義作出新的解釋，提出當西半球國家出現長期的嚴重失序，且相關情形可能引發外部干預時，美國可能承擔維持秩序的責任，并在極端情況下行使所謂“國際警察權力”⁷⁾。美國國家檔案館与美國國務院外交史辦公室均

6) Monroe, James. 1823. “Seventh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2, 1823.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 Wool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seventh-annual-message-1>

7) Roosevelt, Theodore. 1904. “Fourth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6, 190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04,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https://www.presidency>

將這一政策表述概括為“羅斯福推論”，並指出其擴大了門羅主義的適用範圍。⁸⁾

羅斯福推論改變了門羅主義的政策功能。1823年的核心關切集中于限制歐洲列強擴大在美洲的殖民與政治控制，1904年的政策解釋進一步將美國的地區角色推進到西半球內部秩序管理領域。由此，美國對西半球的特殊利益主張逐漸與干預權、秩序維護責任以及地區等級關係相聯系。其歷史意義可以概括為兩個層面的變化：第一，戰略對象由外部歐洲列強擴展至可能引發外部介入的地區內部問題；第二，政策工具由外交宣示擴展至強制性干預與秩序管理。門羅主義由此獲得更明顯的勢力範圍政治特征。

從“美洲人之美洲”到“美國人之美洲”再到“美國人之世界”，美國將“門羅主義”的觸角伸向了世界各地。美國的歷屆政府，不論是民主黨執政還是共和黨執政，“門羅主義”仍被歷屆政府奉為圭臬，成為一致對外的行動指南。“門羅主義”背後所折射出的是美國根深蒂固的霸權主義和防禦性修正主義的思維方式。

表 1 門羅主義的歷史演變及“唐羅主義”的繼承與變化

比較維度	傳統門羅主義	羅斯福推論	“唐羅主義”及特朗普推論
時期	1823年提出，19世紀持續被援引與擴展	1904年提出，20世紀初形成更強的干預實踐	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正式提出“Trump Corollary”
歷史背景	拉美獨立進程與歐洲列強可能恢復殖民和政治干涉	美國實力上升，委內瑞拉債務危機及歐洲強制介入風險	大國競爭加劇，美國強調本土安全、戰略資產、供應鏈與近域控制
核心戰略目標	限制歐洲列強擴大在西半球的殖民和政治控制	防止歐洲借地區失序介入，同時擴大美國維護地區秩序的權力	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優位，排斥域外戰略進入，保護關鍵資產與戰略地點
主要針對對象	歐洲列強	歐洲列強以及被美國認定可能引發外部介入的拉美國家問題	非西半球競爭者、跨國犯罪組織及被視為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的地區行為體
主要政策工具	政治宣示、外交警告	強制外交、軍事干預、財政與秩序管理	軍事存在調整、海上力量、經濟與金融槓杆、貿易政策、安全合作和戰略資產政策

ucsb.edu/documents/fourth-annual-message-15

8) U.S. National Archives. “Theodore Roosevelt’s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 <https://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roosevelt-corollary>

2. 霸權衰落与修正主義研究

國際秩序的演化方向及其結構性調整長期以來都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与國家戰略實踐中的核心議題。⁹⁾修正主義研究長期關注國家對既有國際秩序、權力分配和制度安排的滿意程度。權力轉移理論通常將主導國与現狀維護聯系起來，並將崛起國的實力增長、對既有利益分配的不滿以及修正主義傾向視為體系沖突的重要條件。¹⁰⁾這一傳統解釋為理解權力轉移与秩序變遷提供了重要起點，同時也容易形成將修正主義主要歸因于崛起國的分析偏向。在經典國際關係理論敘事中，通常認為，試圖改變現存國際體系運行規則的新興大國被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而占据主導地位的霸權國家則通常承擔維護既有秩序穩定性的角色。¹¹⁾當前既有研究通常把修正主義与崛起國聯系起來，而本文強調“衰落霸權也可能修正規則”。處於相對衰退階段的既有霸權國同樣可能成為國際秩序的修正力量。由于擔憂自身優勢地位受到新興力量挑戰，霸權國會產生所謂“地位置換焦慮”，並由此採取具有修正主義性質的戰略行為。換言之，修正主義行為并非新興大國的專屬特征，處於權力轉移壓力之下的衰落霸權國家，憑借其仍然占据的資源優勢与制度影響力，反而可能成為推動國際體系調整的重要行為主體。

近年來的研究進一步擴展了修正主義概念的適用範圍。Schweller指出，霸權國同樣可能具有改變現存秩序的能力与動機。¹²⁾Cooley、Nexon与Ward將國際秩序与軍事力量分配加以區分，構建了二維修正主義類型學，並據此討論“修正主義霸權國”的可能性。¹³⁾Chan進一步提出，既有主導國在相對地位下降、維持現存制度的收益減少時，也可能對其曾參與塑造的規則与制度進行調整，並以美國及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政策實踐說明霸權國修正主義的經驗可能

9) Kingsbury D, McKay J, Clarke M, et al.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J]. 2026.

10) Organski A F K, Kugler J. The war ledger[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1) 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2) Schweller R. Rising powers and revisionism in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s[J]. Valdai Papers, 2015, 16: 1-15.

13) Cooley A, Nexon D, Ward S. Revising order or challenging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An alternative typology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state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45(4): 689-708.

性。上述研究共同表明，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既有主導地位無法直接推出其持續維護全部現存規則的政策取向。¹⁴⁾

地位焦慮理論能夠進一步解釋主導國為何在相對優勢受壓時提高競爭強度。Onea將“地位焦慮”界定為主導國對自身高位排序可能下降的擔憂，並從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聲望等維度分析這種擔憂對大國競爭的影響。隨著新興力量接近或挑戰主導國的既有排序，地位焦慮可能提高主導國抵制地位變化的意願，並增加其對高風險戰略的接受程度。對於本文而言，這一理論為理解美國在全球相對優勢受到競爭壓力時為何更加重視近域優勢、戰略資產與地區排他性提供了重要機制。¹⁵⁾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文提出“防禦性修正主義”(Defensive Revisionism)作為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西半球戰略的分析性概念。該概念由本文依據霸權修正主義研究、修正主義類型學與地位焦慮理論加以綜合，使用時需要明確其理論來源和作者的概念建構屬性。本文將防禦性修正主義界定為：既有主導國在相對優勢收縮或預期地位下降的壓力下，為維持核心權力地位與關鍵區域優勢，對部分國際規則、制度安排和地區秩序實施選擇性調整、重構或突破的戰略取向。其“防禦性”體現在動因上，即維護既有優勢和規避損失；其“修正主義”體現在手段上，即突破或重塑原有規則、制度和地區關係模式。這一概念可以通過四項指標加以識別。第一，觸發條件表現為主導國感知相對優勢收縮、戰略空間受壓或地位排序受到挑戰。第二，戰略目標集中於維持既有優勢地位，尤其重視本土周邊、關鍵地區與戰略資產。第三，修正對象具有選擇性，政策行動針對被認為限制主導國行動自由、增加競爭者進入機會或削弱地區位位的規則和制度。第四，政策工具具有多樣性，可包括軍事威懾、經濟施壓、制度退出、規則重構、戰略資產控制與排他性地區安排。通過上述指標，可以將“防禦性修正主義”轉化為可觀察的分析框架，並降低概念泛化的風險。

這種“防禦性修正主義”，是指既有霸權國在相對優勢下降和地位焦慮上升的條件下，並非為了推翻全部現有的國際體系，而是為了維持自身優勢地位，對

14) Chan S. Challenging the liberal order: the US hegemon as a revisionist power[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97(5): 1335-1352.

15) Onea T 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40(1): 125-152.

既有規則、地區秩序和制度安排進行選擇性修改的戰略行爲，爲延緩自身優勢衰減并維持其在國際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其“防禦性”體現在動因上，即維護既有優勢；其“修正主義”體現在手段上，即突破或重塑原有規則。

“唐羅主義”所追求的并非單一意義上的區域影響力擴張，而是旨在全面強化美國對西半球事務的支配能力。該戰略不僅體現爲對委內瑞拉能源資源的戰略控制、對格陵蘭島潛在礦產價值的爭奪，以及對重要地緣戰略節點的主導訴求，更試圖將領土影響力擴展、資源配置優勢和美國全球威望恢復融爲一體。在政策工具層面，特朗普政府通過拘捕馬杜羅這一自伊拉克戰爭以來罕見的單邊強制性政權更替行動，并輔以持續性的公開威懾與政治施壓，展現出較高程度的風險承受意願以及對強制性手段的偏好。由此可見，“唐羅主義”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目標範圍的廣泛性與政策手段的強制性相結合，通過突破傳統國際規範約束，推動國際關係由規則導向模式向權力等級模式轉變。

3. 勢力範圍政治研究

從歷史演進視角來看，國際體系由單極結構向多極格局轉型的過程中，處於相對衰退階段的霸權國家往往傾向於通過鞏固區域控制力、強化勢力範圍以及重塑戰略邊界，以延緩自身國際地位下降趨勢。在缺乏能够有效約束國家行爲并擁有最高強制執行能力的國際無政府體系中，勢力範圍具有一定程度的結構性存在基礎，“所有國家均面臨着提升自身權力與安全水平的持續性壓力”。¹⁶⁾ 冷戰時期，美蘇兩極競爭正體現了這一權力邏輯：雙方分別在歐洲、中亞等關鍵區域构建政治與安全影響圈，并圍繞發展中國家的戰略歸屬展開長期競爭。然而，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建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試圖突破傳統勢力範圍政治的限制，通過推广基于規則、制度和普遍性原則的全球治理模式，构建一種不以地理區位和力量分布爲決定因素的國際秩序體系。與冷戰時期以區域划分爲基礎的大國競爭模式相比，該秩序強調國際規則的普遍適用性以及國家間關係的制度化約束。

然而，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實際上已經承認，以普遍性規則和制度規範爲基礎的全球主義治理模式正面臨嚴重困境。作爲回

16) Latham A.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J]. Defense Priorities, 2022.

應，特朗普政府逐漸放棄以普世價值和規則體系為核心的傳統敘事框架，轉而重新強調以“勢力範圍”為基礎的地緣政治邏輯。¹⁷⁾該戰略文件明確提出，美國將在長期忽視門羅主義之後重新強化其適用性，通過恢復並執行門羅主義原則，重新確立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同時保障美國本土安全以及對區域關鍵戰略空間的進入能力。此外，美國還試圖限制域外競爭力量在西半球進行軍事部署或實施戰略影響。上述表述表明，美國西半球戰略正在發生明顯的理念轉向：即從過去以民主推廣、人權保護和經濟合作為主要話語包裝的區域政策模式，轉向更加突出地緣排他、戰略控制和資源支配的權力政治模式。特朗普政府推動西半球權力重構的目標並非僅僅在於應對外部安全壓力，而是在更深層次上試圖重新確立一種基於實力差異的等級性國際關係原則，即強化強者對弱者的支配權。¹⁸⁾從國際體系結構角度來看，勢力範圍邏輯的重新興起本身可能成為國際不穩定的重要來源。這是因為該邏輯並非產生於傳統兩極格局，而是在當前不存在單一國家能夠完全劃定全球政治邊界的多極化環境中重新出現。一個相對穩定的勢力範圍體系通常需要滿足三個基本條件：第一，處於影響範圍內的國家認可並接受自身的從屬關係；第二，不同大國之間的勢力邊界保持相對清晰，避免區域範圍相互交疊；第三，各主要力量對既定勢力範圍形成某種程度的正式或非正式認可。¹⁹⁾在當前國際結構條件下，“唐羅主義”的戰略實踐恰恰同時削弱了上述三個穩定條件。一方面，中國和俄羅斯已經具備在全球和區域層面對美國戰略布局形成制約的綜合能力；另一方面，兩國均具有擴大自身戰略影響空間、抵消美國單極優勢的現實動機。因此，美國試圖通過恢復西半球排他性控制來鞏固自身霸權，不僅難以實現穩定的區域秩序塑造，反而可能進一步加劇大國競爭、勢力範圍碰撞以及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

17) Van Jackson, “Understand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5, No.3, 2019, pp.1-19.

18) Ian Bremmer. “The law of the jungle” : How President Trump’s “Donroe Doctrine” is sending shockwaves through Europe [EB/OL]. <http://edition.cnn.com/2026/01/07/politics/video/donroe-doctrine-greenland-trump-threats>.

19) Latham A.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J]. *Defense Priorities*, 2022.

三. “唐羅主義”的三重驅動力

1. 安全驅動

地緣經濟變化構成戰略競爭的物質基礎，安全化認知負責把這種經濟變化轉化為國家安全問題。“唐羅主義”的戰略生成邏輯，根植於美國對於所謂“修正主義力量”進入並改變其傳統影響區域的戰略憂慮。委內瑞拉問題恰好成為這一邏輯展開的重要案例。在特朗普政府的戰略認知中，馬杜羅領導下的委內瑞拉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地區性政治危機國家，而被視為中國和俄羅斯在西半球拓展戰略影響的重要支點。

具體而言，中國長期作為委內瑞拉能源出口的重要合作伙伴，通過石油貿易、金融支持以及相關合作機制擴大其在該國的經濟影響；俄羅斯則通過軍事合作、人員部署以及情報聯系等方式維持在委內瑞拉的戰略存在。²⁰⁾從美國決策層的安全認知來看，委內瑞拉與中俄之間不斷深化的政治、經濟和安全聯系，意味着美國傳統西半球優勢空間正受到外部力量的侵蝕，並被視為對“美國優先”戰略理念的直接挑戰。

特朗普政府認為，此類外部力量進入美國傳統影響區域的行為，突破了美國長期以來圍繞西半球建立的戰略秩序邊界。在這一認知框架下，委內瑞拉發展對外戰略合作關係不再被單純理解為主權國家基於自身利益作出的外交選擇，而被重新定義為可能威脅美國區域安全利益的戰略性行為，並成為美國採取強制措施的重要依據。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進一步闡釋了這一政策邏輯，強調“西半球屬於美國的核心安全空間，美國不會允許競爭者、對手或敵對力量利用該地區作為戰略活動平台”。²¹⁾這一表述揭示了“唐羅主義”的深層戰略假設：即西半球並非完全開放的國際競爭空間，而被美國視為具有特殊地緣屬性的安全區域。在這一邏輯下，任何域外力量在該地區擴大政治、經濟或軍事

20) 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B/OL]. The White House, 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21) U.S. Mission Brazil. RUBIO: This Is Our Hemisphere--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Not Allow Our Security to be Threatened [EB/OL]. The White House, <http://br.usembassy.gov/rubio-this-is-our-hemisphere-and-president-trump-will-not-allow-our-security-to-be-threatened>.

影響，均可能被美國視為對自身區域主導權和國家安全利益的挑戰。

2. 地緣經濟驅動

特朗普第二任期西半球戰略中的地緣經濟考量，需要置于美國對地區力量格局變化的整體認知中加以理解。中國在拉美不斷擴大的貿易、融資、能源和基礎設施合作首先改變了地區經濟聯系結構，部分經濟活動隨後進入港口、能源、通信、礦產和交通節點等具有戰略屬性的領域。美國國會研究處指出，隨著中國成為拉美重要經濟行為體，美國政策制定者越來越關注中國企業在深水港、通信網絡、空間設施和其他關鍵基礎設施中的參與，並擔憂相關經濟存在可能在危機條件下產生安全外溢效應。²²⁾由此，中國在西半球的經濟存在逐漸超出一般商業競爭的政策範疇，並在美國戰略認知中與地區安全、供應鏈穩定及半球主導權產生聯系。

這一變化的關鍵傳導機制在於經濟議題的安全化。2025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美國需要維護西半球關鍵供應鏈，防止域外競爭力量控制具有戰略意義的資產，並要求識別和保護地區戰略地點與戰略資源。該文件進一步將港口、關鍵基礎設施和戰略資產與域外力量影響聯系起來，同時主張運用金融、技術以及政府融資工具擴大美國企業在地區能源、礦產和基礎設施領域的參與。²³⁾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已經將資源獲取、供應鏈安全與地區力量競爭納入同一戰略邏輯。中國經濟活動在這一政策框架中被賦予潛在安全含義，資源競爭也由市場層面的利益競爭進一步轉化為區域主導權競爭。

中國在拉美的經濟存在本身不足以解釋美國政策強制化的具體時點和強度。然而，中國成為拉美重要行為體以及美國地區影響力下降可以形成美國戰略回應的結構性壓力，但結構條件需要通過國內政策過程才能轉化為具體外交行為。²⁴⁾特

22) China's Engagement with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B/OL]. Congress.gov, https://www.google.com/url?sa=t&source=web&rct=j&opi=89978449&url=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IF10982&ved=2ahUKEwibi6Lu95-WAxVyVPUHHTx_PLsQFnoECBoQAQ&usg=AOvVaw1Uo8ICOCrNr10sMD9TGxc0.

23) 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B/OL]. The White House, 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24) Van de Maele D L. Explaining the belated US response to China's advances in Latin America[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6, 102(3): 903-924.

朗普時期反華政治氛圍、關鍵政策人員變化以及既有政策工具之間形成的政策窗口，為美國提高對華競爭強度創造了國內條件。由此，本文將中國經濟嵌入視為結構性驅動因素，將美國決策層對區域優勢和戰略資產風險的安全化認知視為中介機制，並將國內政策窗口視為結構壓力向政策行動轉化的重要條件。

巴拿馬運河問題集中體現了這一機制。特朗普政府將中國企業在運河周邊基礎設施領域的存在與美國國家安全直接聯繫起來，並在2025年初明顯提高對巴拿馬的外交壓力。魯比奧訪問巴拿馬後，巴拿馬政府宣布不再續簽2017年與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特朗普政府隨後將這一變化解釋為限制中國西半球影響的重要戰略成果。由於巴拿馬政府對有關決策時間和原因存在不同表述，該案例更適合證明中國在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的經濟存在已經觸發美國的安全化認知和政策施壓，至於美國壓力在巴拿馬政策調整中發揮的獨立因果作用，則需要保持審慎判斷。

委內瑞拉則進一步呈現了資源安全與大國競爭相互疊加的政策邏輯。長期以來，中國通過石油貿易和金融合作與委內瑞拉建立較為密切的能源聯系。中國仍是委內瑞拉石油的重要外部市場，美國政府則持續把委內瑞拉能源流向與域外力量影響聯系起來。2025年，美國授權針對進口委內瑞拉石油的國家採取額外關稅措施；2026年1月軍事行動以後，特朗普政府又公開提出限制外部對手利用委內瑞拉石油資源，並強化對石油銷售、運輸及相關資金的控制。相關政策說明，委內瑞拉石油在美國戰略中的意義已經同時涉及能源利益、供應鏈安全和區域競爭。

與此同時，資源競爭和中國因素應被限定為美國對委政策的結構性驅動因素之一。美國對委內瑞拉政策還受到毒品治理、刑事司法、移民壓力、馬杜羅政權性質以及俄羅斯、伊朗等域外力量活動的共同影響。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經濟存在與美國強制政策之間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係。中國經濟嵌入程度越高，如果相關合作進一步涉及能源、港口、通信和戰略資源等敏感領域，並同時伴隨美國地區優勢受損認知、對象國與美國政治關係惡化以及有利于政策升級的國內政治條件，美國採取強制性政策工具的可能性才會相應提高。由此，“唐羅主義”的地緣經濟邏輯可以理解為資源安全、半球優勢維護和大國競爭壓力經過安全化機制相互耦合的結果。

3. 國內政治驅動

此次針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還具有明顯的國內政治動員功能。特朗普的支持群體長期期待政府採取能夠體現美國力量優勢和國際領導地位的強勢行動，而此次行動，尤其是通過媒體傳播馬杜羅在美國軍艦平台上接受審判的相關影像，被塑造成一種面向國內公眾的政治傳播事件。外交政策中的複雜戰略博弈，在這一過程中被轉化為易于傳播的“勝利敘事”。正如相關研究所指出，傳統外交競爭正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交媒體時代的政治展示所替代，而對外國領導人的強制控制則成為滿足國內選民對於力量展示和秩序恢復期待的重要象征。²⁵⁾

由此來看，此次行動至少實現了三方面政治效果：第一，通過展示快速決策和軍事執行能力，強化特朗普個人領導形象；第二，為其政治支持基礎提供了具有象征意義的成功案例；第三，通過展示美國採取強制措施的能力，對西半球其他國家釋放明確信號，即任何挑戰美國區域主導地位的行為都可能遭遇高強度戰略回應。

四．“唐羅主義”的邏輯悖論

1. 戰略悖論

美國為緩解霸權焦慮而強化對西半球的控制，但這種強制擴張反而加劇他國對美國霸權的不信任。這一現象體現了霸權維持過程中的典型戰略悖論：霸權國家為了防止自身優勢地位受到挑戰，往往會採取更加積極甚至強硬的戰略行動；然而，其他國家並不會將這種行為理解為單純的防禦性措施，而更可能視其為權力擴張和利益攫取的表現，進而採取防范、制衡甚至反抗措施。

從美國自身戰略認知來看，“唐羅主義”的提出與實施，本質上源于美國對相對衰落趨勢以及外部競爭力量進入西半球的深層擔憂。在美國決策者看來，中國與俄羅斯在拉美地區不斷擴大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影響，正在侵蝕國長期以

25) MONNAPPA K C. The “Donroe Doctrine”: Hegemonic Decline, Revisionism, and the Erosion of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J].

來對西半球事務享有的特殊地位。因此，通過重新強調門羅主義邏輯、強化區域排他性以及限制域外力量介入，美國試圖重新確立自身在“后院”事務中的絕對主導權。這種戰略行為體現出一種典型的霸權防禦邏輯，即通過擴大控制範圍來降低不確定性，通過壓縮競爭對手活動空間來維持自身優勢。然而，從其他國家的視角來看，美國強化西半球控制的行為並不一定被理解為維護地區穩定，而可能被視為對國家主權平等原則和戰略自主空間的侵蝕。尤其是在拉美地區，美國長期干預傳統所造成的歷史記憶，使得相關國家對於美國以安全、民主或反外部威脅為名實施的政治和軍事介入保持高度警惕。當美國再次以“西半球安全不可分割”為理由強化軍事存在和政治影響時，部分國家可能認為，這並非單純應對外部威脅，而是試圖恢復傳統勢力範圍體系，將拉美重新置於美國主導的等級性區域秩序之中。從長期效果來看，美國通過“唐羅主義”強化西半球控制可能實現短期威懾效果，例如限制部分競爭對手在拉美地區的活動空間，提升美國在特定地區的政治影響力。但這種依靠強制而非吸引力維系霸權的方式，可能削弱美國領導地位的穩定基礎。

因此，“唐羅主義”所體現的核心戰略悖論在於：美國試圖通過強化控制來避免霸權衰退，但其強制性擴張行為本身却可能加速霸權合法性的流失。這種“以維護霸權為目的、却削弱霸權基礎”的戰略困境，正是衰落中的霸權國家在權力轉型時期所面臨的重要挑戰。“唐羅主義”所體現的並不是單純的區域政策回歸，而是美國試圖通過強化勢力範圍控制，重新確認西半球屬於自身核心利益區域的一種戰略回應。對於國際秩序而言，其影響不僅表現為美國與西半球國家關係的變化，更可能推動全球範圍內對美國主導秩序的重新評估，並加劇未來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

2. 規範悖論

美國以維護安全、規則和秩序為名採取行動，却削弱主權平等、禁止單邊使用武力和多邊授權等規則基礎。即美國長期以來將自身塑造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主要維護者，但當既有規則對其戰略目標形成約束時，其政策行為又可能表現出對規則的選擇性解釋甚至突破。這種“以規則之名行權力之實”的邏輯，使美國自身倡導的國際秩序面臨合法性困境。

在主權平等原則層面，美國以維護地區安全為由強化對西半球事務的介入，實際上弱化了國際體系中主權國家自主決策的基本原則。現代國際秩序的核心基礎之一，是承認國家無論大小、實力強弱，在法律意義上均享有平等地位，並有權自主選擇外交關係、安全伙伴以及發展路徑。然而，在“唐羅主義”的戰略邏輯下，西半球被重新定義為美國具有特殊安全利益的地緣空間，域外力量與地區國家之間的正常合作關係可能被重新解釋為對美國安全利益的挑戰。

在禁止單邊使用武力原則方面，美國的行為對二戰後國際安全體系構成直接挑戰。《聯合國憲章》確立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則，其核心目的就在於防止國家以自身利益判斷替代國際共同授權，避免國際體系重新陷入強權政治。然而，當美國以打擊威脅、維護地區穩定或防止競爭對手擴張為理由，對他國採取未經充分國際授權的軍事行動時，實際上改變了武力使用的合法性標準。在這一過程中，安全概念被不斷擴大化。原本需要明確、迫切的軍事威脅，逐漸被延伸至政治制度差異、外交伙伴關係以及經濟合作選擇等領域。這樣一來，任何不符合美國戰略利益的行為，都可能被重新定義為安全風險，並成為採取強制措施的理由。這種安全化邏輯降低了使用武力的門檻，使國際社會擔憂：如果主要國家均以自身安全判斷作為採取軍事行動的依據，那麼國際法對於限制戰爭和維護和平的功能將受到削弱。

在多邊授權機制層面，美國的單邊行動削弱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治理體系。二戰後的國際秩序設計，本質上試圖通過多邊制度約束強國行為，使軍事行動不再完全取決於單個國家的意志。然而，當美國繞過聯合國安理會等多邊機制，以自身判斷決定何時、何地以及如何使用武力時，實際上削弱了國際組織在處理安全問題上的權威。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種做法可能產生示范效應。如果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可以基於自身戰略判斷突破多邊授權要求，那麼其他國家也可能據此為自身行動尋找類似理由。國際體系中的規則將因此從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範，轉變為由實力較強國家選擇性適用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秩序不再主要依靠規則協調國家行為，而越來越依賴國家間實力對比進行調節。

因此，“唐羅主義”的深層影響並不僅在於改變美國對西半球的政策方式，而在於它揭示了當前國際秩序中的一個核心矛盾：霸權國家試圖通過突破規則來維護規則，通過削弱制度來保護制度。美國以安全、規則和秩序為名採取行

動，却可能削弱支撐國際秩序運行的主權平等、限制武力使用和多邊治理原則。這種規範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正是當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

3. 秩序悖論

美國試圖通過恢復勢力範圍邏輯來鞏固自身戰略優勢，本質上是衰落霸權國家應對相對實力下降和外部競爭壓力的一種戰略回應。這種以劃分地緣控制區域、強化排他性影響力為核心的秩序維護方式，可能刺激其他大國和地區強國效仿，從而推動國際體系由規則競爭轉向勢力範圍競爭，加速國際秩序碎片化。

國際秩序中的規則不僅依靠法律文本維系，也依賴主要國家長期實踐形成的行為規範。當強國突破既有規則並獲得現實收益時，其他行為體可能認為模仿這一行為能夠提升自身安全和戰略利益。因此，美國恢復西半球勢力範圍的做法，可能向其他國家釋放一個危險信號，即通過軍事力量、政治干預或經濟壓力建立區域主導地位是一種有效的戰略工具。對於全球主要力量而言，這種示范效應可能表現為更強烈的區域競爭。將導致國際體系出現更加明顯的“區域等級化”趨勢。不同地區可能形成由主要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和安全體系，而這些體系之間缺乏統一協調機制。全球秩序因此可能從相對統一的規則框架，轉變為多個區域性權力中心並存的競爭結構。在這種環境下，國家間衝突不再主要圍繞全球規則展開，而更多表現為不同勢力範圍之間的邊界爭奪。在這種情況下，勢力範圍競爭並不會形成穩定均衡，反而可能造成持續摩擦。因為每個國家都可能認為自身安全需要擴大影響空間，而其他國家又會將這種擴張視為威脅，從而採取反制措施。這一過程符合安全困境的基本邏輯：一國為了提高安全採取的措施，會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感，進而導致更大規模的競爭升級。

因此，美國通過“唐羅主義”恢復勢力範圍，並不能真正消除其霸權焦慮，而可能形成一種自我強化的循環：美國為了防止競爭者進入自身影響區域而強化控制；其他國家則因擔憂美國擴張而加強自身勢力範圍建設；新的競爭又進一步強化美國的不安全感。其結果不是建立更加穩定的國際秩序，而是推動國際體系向更加分裂、競爭和不確定的方向發展。從這一意義上看，“唐羅主義”的

最大風險并不只是美國對西半球政策的變化，而是它可能改變國際政治的基本行為邏輯：如果勢力範圍重新成為大國競爭的主要原則，那麼未來國際秩序將不再主要由普遍規則和制度協調維系，而可能越來越取決于不同力量中心之間的權力博弈。

五．國際秩序后果：從規則約束到勢力範圍競爭

針對馬杜羅實施的軍事行動在國際法層面引發了廣泛爭議，其行為被認為突破了戰后國際體系確立的若干基本法律規範，並對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規則體系造成了嚴重沖擊。首先，《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確立了禁止非法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則，明確規定任何國家不得以武力威脅或武力方式侵犯他國領土完整、政治獨立，或採取違背聯合國宗旨的強制性行為。²⁶⁾然而，美國此次跨境軍事行動的目標在於推動委內瑞拉政治權力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即實現所謂“政權更迭”，同時並未獲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因此被認為與國際法中關於限制單邊武力使用的规范要求存在明顯沖突。特朗普政府在行動結束后的相關表態進一步強化了外界對於美國弱化國際法約束的擔憂。特朗普公開宣稱，美國的行動并不需要受到國際法律規則的限制，能夠約束其決策的主要來自自身價值判斷和政治意志。²⁷⁾這種將國家實力置于國際規範之上的權力觀，本質上體現了以實力邏輯替代法律邏輯的霸權主義傾向。其潛在影響不僅在於削弱戰后國際秩序賴以維系的規則基礎，更可能加劇國際社會在安全保障和規範適用方面的不確定性。從國際體系層面來看，如果主要國家可以基於自身實力優勢選擇性突破既有國際規則，那麼以主權平等、禁止侵略和和平解決爭端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將面臨持續侵蝕。在這一意義上，該行動不僅是一次區域性軍事事件，更反映出國際關係中權力政治重新強化的趨勢。其所釋放的

26) United Nations Charter. 26 June 1945. United Nations, <https://www.un.org/en/about-us/un-charter/chapter2>.

27) Maya Yang, 'I don't need international law': Trump says power constrained only by 'my own morality' [EB/OL]. (2026-01-11). [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jan/08/trump-power-international-law/\(2026-07-02\)](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jan/08/trump-power-international-law/(2026-07-02)).

信号可能推動更多國家以實力競爭替代制度合作，從而增加國際體系的不穩定因素，并進一步強化全球範圍內對“叢林法則”回歸風險的擔憂。因此，該行動遭到了部分國際社會成員及國際輿論的批評，其影響已超越委內瑞拉問題本身，涉及戰后國際秩序合法性與穩定性的根本問題。

如果“唐羅主義”所代表的戰略邏輯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即霸權國家可以通過單邊軍事行動維護自身划定的勢力範圍，那么現有國際治理體系可能面臨更深層次的結構性沖擊。在這一情境下，國際體系或將進一步向區域化、碎片化方向發展，不同地區可能形成由主要國家主導的等級性權力結構，大國之間圍繞地緣影響空間展開更加激烈的競爭。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實踐模式可能為部分地區性強國提供效仿依據，使其以維護自身安全利益或傳統影響區域為名，通過武力方式擴大地區控制範圍。在此邏輯延伸下，一些具有區域影響力的國家可能借此強化自身干預行為的合法性敘事。例如，印度可能以維護周邊安全為由加強對南亞鄰國事務的介入；巴西可能尋求擴大其在南美洲周邊地區的政治影響；埃及可能強化其在尼羅河流域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土耳其也可能進一步擴大其在敘利亞、伊拉克等周邊區域的軍事存在。由此可見，削弱單邊使用武力限制機制并不會自然形成新的穩定秩序，反而可能誘發更多區域性權力競爭，使多個行為體同時尋求建立自身勢力範圍，最終導致國際體系陷入更加複雜的不穩定狀態。²⁸⁾

“唐羅主義”的實踐同時也將對西半球地區戰略格局產生深遠影響。²⁹⁾美國針對委內瑞拉採取的強制性措施，可能產生明顯的示范效應和外溢效應。作為拉美地區傳統“反美陣營”中的重要國家，委內瑞拉受到打擊后，可能進一步削弱古巴、尼加拉瓜等國維持獨立外交路線的空間，并對其他拉美左翼政府形成戰略壓力。尤其對於即將舉行政治選舉的部分拉美國家而言，美國展現出的軍事和政治施壓能力可能產生“寒蟬效應”，促使部分國家在安全保障與發展合作之間進行重新權衡，并在戰略選擇上更加傾向於向美國靠攏。從拉美歷史經驗來看，美國長期以來對地區事務的強勢介入并未徹底消除反美情緒，反而可能在

28) Zhu C, Yang S. Peaceful rise to power: the role of interstate leadership[J]. Transforming Government: People, Process and Policy, 2026, 20(3): 417-442.

29) Dewardric L. McNeal. Op-ed: Trump's 'Donroe Doctrine' and China are headed for Latin American clash.[EB/OL].(2026-01-11). <http://www.cnn.com/2026/01/11/trump-venezuela-greenland-donroe-doctrine-china.html>,(2026-07-03).

一定程度上積累地區社會和政治層面的抵觸心理。當這種不滿達到臨界狀態后，可能再次以政治反彈或民族主義動員形式表現出來。因此，美國試圖通過強化控制恢復西半球主導地位，既可能提升短期戰略影響力，也可能增加長期地區關係的不確定性。

六．“唐羅主義”的外部回應

“唐羅主義”能否推動西半球乃至國際秩序發生持續性變化，還受到美國盟友態度以及多邊制度反應的共同影響。國際秩序的轉型需要政策實踐在國家間形成一定程度的接受、追隨或制度化，僅憑單一霸權國家的戰略調整難以直接推導出整體秩序轉型。由此，判斷特朗普政府能否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優勢地位，不能只觀察美國擁有的軍事、經濟和制度資源，還需要考察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是否愿意接受美國對其外交、安全與經濟選擇施加特殊限制，以及這些國家是否愿意壓縮與中國、俄羅斯等域外力量的合作空間。區域國家的接受、抵制和選擇性配合，構成檢驗“唐羅主義”能否形成穩定勢力範圍的關鍵經驗指標。³⁰⁾

從地區主要國家的反應看，美國強化西半球控制首先遭遇了較為明確的主權型抵制。巴西在2026年1月6日美洲國家組織特別會議上強調，外部軍事干預可能使國家間關係滑向強國支配弱國的等級狀態，並明確反對在拉丁美洲建立“保護國”式安排，同時重申不干涉、自決和南美和平傳統。³¹⁾巴西的政策立場表明，南美地區性大國所維護的戰略自主與美國強化半球優位的要求存在結構性張力。巴西對美國行動的反應因此具有超出委內瑞拉個案的秩序含義，其關注重點涉及地區國家是否仍能自主決定政治發展道路以及南美能否繼續維持免

30) Jackson V. Understand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0, 5(3): 255-273.

31)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do Brasil. Discurso do Representante Permanente do Brasil, Embaixador Benoni Belli, na Sessão Extraordinária da OEA sobre Venezuela [EB/OL].(2026-01-06). <https://www.gov.br/mre/pt-br/centrais-de-conteudo/publicacoes/discursos-artigos-e-entrevistas/diplomatas/discursos/discurso-do-representante-permanente-do-brasil-embaixador-benoni-belli-na-sessao-extraordinaria-da-oea-sobre-venezuela-2013-6-de-janeiro-de-2026/>,(2026-08-13)

受外部强制干預的地區規範。墨西哥和哥倫比亞同樣從主權与地區和平的角度回應美國政策。墨西哥政府于2026年1月3日公開譴責美國在委內瑞拉采取的單邊軍事行動，重申不干涉、和平解決爭端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和平區原則。³²⁾哥倫比亞政府也拒絕可能加劇地區緊張的單邊軍事行動，并在邊境地區啓動安全与人道主義準備，同時提出通過區域和多邊机制推動局勢降溫。³³⁾作爲与美國經濟、安全聯系高度密切的兩個國家，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的反應說明，對美依賴程度較高并不會自然轉化爲對美國半球特殊干預權的政治認可。地區國家仍然可以在安全合作与主權原則之間進行區分，并借助多邊制度降低單邊强制行動對本國及周邊安全环境的外溢風險。

區域國家的疑慮還進一步延伸到資源主權層面。2026年1月4日，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墨西哥、烏拉圭和西班牙發表聯合聲明，在反對單邊軍事行動的同時，特別表達了對外部力量控制、管理或占有委內瑞拉自然資源和戰略資源的擔憂。³⁴⁾該聲明使美國軍事行動、委內瑞拉資源控制与地區秩序問題進入同一政策討論框架。對於本文而言，這一反應具有重要意義，因爲“唐羅主義”的地緣經濟邏輯本身就包含能源、戰略礦產与地區控制之間的聯動。当部分拉美國家把外部資源控制視爲威脅地區政治与經濟穩定的因素時，美國試圖通過強化資源配置能力鞏固地區優勢，也會同步增加其在拉美面臨的經濟主權与合法性成本。

拉美地區同時存在對美國行動持支持態度的國家。阿根廷政府在2026年1月3日的正式聲明中積極評價特朗普政府針對委內瑞拉采取的行動，并將其与打擊毒品恐怖主義、恢復民主和法治聯系起來。³⁵⁾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國的

32)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México. México condena intervención militar en Venezuela. Comunicado [EB/OL]. (2026-01-03). <https://www.gob.mx/sre/prensa/mexico-condena-intervencion-militar-en-venezuela/>, (2026-08-13)

33)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de Colombia. Comunicado del Gobierno de Colombia sobre situación en Venezuela [EB/OL]. (2026-01-03). <https://www.presidencia.gov.co/prensa/Paginas/Comunicado-del-Gobierno-de-Colombia-sobre-situacion-en-Venezuela-260103.aspx>, (2026-08-14)

34)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de Colombia. Colombia, Brasil, Chile, España, México y Uruguay rechazan las acciones militares ejecutadas unilateralmente en Venezuela. [EB/OL]. (2026-01-03). <https://www.presidencia.gov.co/prensa/Paginas/Colombia-Brasil-Chile-Espana-Mexico-y-Uruguay-rechazan-las-acciones-militares-260104.aspx>, (2026-08-15).

35)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Comercio Internacional y Culto de Argentina.

主權型抵制與阿根廷的支持性回應形成鮮明差異。這種分化意味着，西半球國家尚未圍繞美國強化地區領導權形成統一立場。美國可以利用不同國家的安全訴求、意識形態取向、對美關係和對委內瑞拉威脅認知擴大政策支持，但地區內部立場差異也使全面、穩定且具有普遍合法性的等級性秩序難以迅速形成。

美國傳統盟友的反應進一步增加了“唐羅主義”的外部合法性約束。在委內瑞拉問題上，英國政府進一步表示未參與此次軍事行動，並要求美國說明相關行動的法律依據。³⁶⁾歐盟在26個成員國支持的聲明中繼續質疑馬杜羅的民主合法性，同時強調委內瑞拉政治轉型應由委內瑞拉自身推動，並要求尊重國際法、主權與聯合國憲章。³⁷⁾格陵蘭問題又將這種規則分歧延伸到盟友領土主權領域。2026年1月6日，丹麥、法國、德國、意大利、波蘭、西班牙和英國領導人聯合聲明，格陵蘭事務應由丹麥和格陵蘭自行決定，並強調主權、領土完整和邊界不可侵犯等原則。³⁸⁾由此可見，美國在西半球強化戰略控制的同時，也可能提高跨大西洋聯盟內部的政治協調成本。這表明美國盟友對於委內瑞拉民主轉型目標具有一定共識，對於美國通過單邊強制手段處理西半球政治問題則保持明顯的規則性保留。

國際組織的回應則體現出另一種約束形式。美國2026年1月3日採取軍事行動之後，聯合國秘書長當天即對有關行動可能形成的危險先例表示嚴重關切。1月5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正式舉行委內瑞拉問題會議。秘書長提交安理會的發言將此次行動與國際法、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禁止使用武力原則聯繫起來，並特別關注其可能對未來國家間關係形成的示范效應。³⁹⁾委內瑞拉同時通

Sobre la situación en Venezuela.[EB/OL].(2026-01-03). <https://cancilleria.gob.ar/es/actualidad/noticias/sobre-la-situacion-en-venezuela/>,(2026-08-15).

36) UK Foreign, Commonwealth and Development Office, 2026. Yvette Cooper, Foreign Secretary Statement to the House on Venezuela, 5 January 2026.<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foreign-secretary-statement-to-the-house-on-venezuela>

37)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2026. Venezuela: Statement by the High Representative on the Aftermath of the U.S. Intervention in Venezuela, 4 January 2026.

38) Statsministeriet, Government of Denmark. 2026. “Joint Statement on Greenland.” 6 January 2026. <https://english.stm.dk/press/press-releases/joint-statement-on-greenland/>

39) United Nations, 2026. Secretary General’s Remarks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on Venezuela, 5 January 2026. <https://trinidadandtobago.un.org/en/307938-un-secretary-generals-statement-un-security-council-venezuela>

過正式文件將有關問題提交聯合國，使美國的軍事行動進入多邊制度的合法性審議過程。聯合國的現實作用由此體現為議程設置、規範確認以及為成員國表達反對意見提供制度性平台。

然而，多邊制度對美國政策的現實約束仍存在明顯限度。聯合國能夠維持相關國際規範的公共有效性，提高單邊行動的合法性成本，並為不同國家提供外交協調平台，但其直接改變美國政策選擇的能力受到大國權力結構、成員國立場分化和制度決策機制的制約。截至2026年8月，聯合國安理會尚未圍繞美國1月3日的委內瑞拉軍事行動通過專門決議。國際組織當前發揮的作用因此主要集中於規範約束、外交審議和合法性競爭層面。從這一意義上看，“唐羅主義”的秩序效應具有明顯的條件性。美國可以依托軍事、經濟和地緣優勢提高其對西半球戰略空間的控制能力，但這種優勢能否進一步轉化為穩定的地區秩序，還受到盟友接受程度、區域國家反應以及多邊制度合法性約束的影響。如果盟友持續強調主權與規則邊界，區域組織繼續維持集體協商原則，美國的勢力範圍戰略將面臨更高的合法性和聯盟協調成本；如果其他大國進一步以類似邏輯建立排他性影響範圍，則可能推動國際體系中的規則普遍性繼續下降，並加劇不同勢力範圍之間的競爭。因此，“唐羅主義”所反映的實力政治強化趨勢已經較為清晰，其能否發展為更廣泛的國際秩序變化，仍取決於相關行為體對這種戰略邏輯的接受、抵制與模仿程度。

七．結論

“唐羅主義”的出現並不能被簡單理解為美國西半球政策的一次局部調整，也不應被視為某一屆政府基於短期利益作出的孤立性政策選擇。其更深層意義在於，它體現了國際秩序運行邏輯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即由一種以制度規範、國際規則和多邊機制為基礎的“規則導向型秩序”，逐步轉向更加依賴實力差異和權力等級關係的秩序模式。在這一演變過程中，軍事能力以及運用強制手段的政治意願，正在重新成為影響國家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秩序變化並非主要由外部威權力量推動，而更多體現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內部主導力量自身的戰略轉向。當美國逐漸發現，僅依靠制度優勢、價值吸引力以及規則塑造能

力難以持續維持其全球領導地位時，便開始更多依賴傳統大國政治中的強制性工具，包括軍事威懾、區域控制以及戰略資源競爭。由此，美國在維護自身優勢的過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過去支撐其國際領導地位的重要制度基礎，而這些制度安排曾在較長時期內降低了大國直接沖突的可能性。

從國際關係理論角度來看，“唐羅主義”的出現既印證了有關霸權轉移和秩序變遷的相關理論判斷，也暴露出現有理論解釋框架的不足。一方面，單純相信自由制度能夠持續約束國家行為的制度主義觀點，難以充分解釋當前國際規範弱化的趨勢；另一方面，認為多極力量平衡能夠自動實現穩定的傳統現實主義假設，也无法完全回應當今國際體系中的複雜互動。當前，全球範圍內大國戰略競爭不斷強化，多邊合作機制受到削弱，國際沖突風險持續上升，顯示出一種由權力競爭、身份認同變化以及制度衰退共同作用形成的新型體系性動蕩。這一複雜變化超出了部分傳統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能力。

因此，“唐羅主義”的意義不只在於美國對委內瑞拉的一次強制行動，而在于它揭示了衰落焦慮中的霸權國如何從規則維護者轉向選擇性規則修正者。其悖論在於，美國越是試圖通過地區排他性控制延緩霸權衰減，越可能削弱其霸權賴以存在的制度合法性；越是試圖以強制手段恢復秩序，越可能推動其他行為體以同樣邏輯主張自身勢力範圍。由此，未來國際秩序的關鍵問題不只是權力如何分布，而是強國是否仍愿意接受能夠約束自身行為的共同規則。

| 参考文献 |

1. 论文及专著

-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M].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50-79.
- Hal Brands. The Unexceptional Superpower :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rump [J]. Survival, 2017(6): 7-40.
- Victor D. Cha. Allied Decoupling in an Era of US -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0(4): 509-551.
- Jay Sexton. The Monroe Doctrine in an Age of Global History [J]. Diplomatic History, 2023(5): 845-870.
- Barry R. Posen. Restraint : A New Foundation for U.S. Grand Strategy [M].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36-162.
- Patrick Porter. Why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Has Not Changed : Power, Habit,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8(4):9-46.
- Kingsbury D, McKay J, Clarke M, et al.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sues and challenges [J]. 2026.
- Organski A F K, Kugler J. The war ledger[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Abramo Fimo Kenneth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Schweller R. Rising powers and revisionism in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s[J]. Valdai Papers, 2015, 16: 1-15.
- Cooley A, Nexon D, Ward S. Revising order or challenging th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An alternative typology of revisionist and status-quo state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9, 45(4): 689-708.
- Chan S. Challenging the liberal order: the US hegemon as a revisionist power[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97(5): 1335-1352.
- Ona T A.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4, 40(1): 125-152.
- Latham A.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J]. Defense Priorities, 2022.
- Latham A.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J]. Defense Priorities, 2022.

- Van de Maele D L. Explaining the belated US response to China's advances in Latin America[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6, 102(3): 903-924.
- MONNAPPA K C. The “Donroe Doctrine”: Hegemonic Decline, Revisionism, and the Erosion of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J].
- Zhu C, Yang S. Peaceful rise to power: the role of interstate leadership[J]. Transforming Government: People, Process and Policy, 2026, 20(3): 417-442.
- 戴維來.(2026).新門羅主義與聯盟交易化互構下美國霸權形態轉型及中國應對.統一戰線學研究,10(4),216-232.
- 潘雨祥. 特朗普“新門羅主義”的霸權邏輯及其對中拉合作的沖擊與應對 [J] . 戰略決策研究, 2026 (2) : 62-80, 127.
- 嚴謹, 王飛. “新門羅主義”的內涵、緣起和前景初探 [J] . 和平與發展, 2025 (5) : 48-70, 184-185, 190-192.
- 孫興杰. 美國戰略收縮與中美關係演化 [J] . 國際問題研究, 2021 (1) : 69-85.
- 曹瑋, 張瀚陽. 戰略收縮、同盟牽連與美國政策困境 [J] . 國際政治科學, 2023 (2) : 26-60.
- 王明國.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全球治理主張及其多重影響 [J] . 國際展望, 2025 (2) : 25-48, 181.
- 李義虎.美國霸權回落及其護持邏輯[J].和平與發展,2026,(2):25-43+168-169.
- 周志偉.特朗普 2.0 拉美政策的動向、意圖及影響[J].當代世界,2026,(3):54-62.
- 趙明昊.“唐羅主義”與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重塑[J].國際關係研究,2026,(1):17-23+155.

2. 其他

- The White House,“America 250: Presidential Message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December2,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12/america-250-presidential-message-on-the-anniversary-of-the-monroe-doctrine/>.
-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ovember,2025,<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26-03-07] .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 NATO. The Hague Summit Declaration [R/OL] . (2025-06-25) [2026-07-07] .

<https://www.nato.int/en/about-us/official-texts-and-resources/official-texts/2025/06/25/the-hague-summit-declaration>.

Ville Sinkkonen. Contextualizing the “Trump Doctrine”: Realism, Transactionalism and the Civilizational Agenda [EB/OL] . (2018-10) [2026-07-21] . https://www.fia.fi/wp-content/uploads/2018/11/analysis10_trump_doctrine3.pdf

Randall L. Schweller. Trump’s Realism [EB/OL] . (2021-04-28) [2026-07-17] . <https://polisci.osu.edu/sites/default/files/2026-01/Schweller%20cv%20%282026%29.pdf>

Callum Sutherland. Trump Again Floats Idea of Venezuela Becoming America’s 51st State [EB/OL] . (2026-03-18) [2026-07-26] . <https://time.com/article/2026/03/18/trump-venezuela-annexation-51st-state-america/>

Connor Stringer, “The Real Reason Trump is Preparing for War with Venezuela,” The Telegraph, October 25, 2025, <https://www.telegraph.co.uk/us/news/2025/10/25/donald-trump-venezuelan-gun-boats/>

| 논문투고일 : 2026년 07월 27일 |

| 논문심사일 : 2026년 08월 03일 |

| 게재확정일 : 2026년 08월 19일 |

| ABSTRACT |

From the Monroe Doctrine to the “Donroe Doctrine”: Trump’s Western Hemisphere Strateg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BA Dian-jun

(Nor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Sun Jianan

(Northeast Asian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Jilin University)

In January 2026, the United States undertook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Venezuela and detained Nicolás Maduro, thereby reactivat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Monroe Doctrine during Donald Trump’s second term. This article conceptualizes this policy orientation as the “Donroe Doctrine” and analyzes the logic underlying its emergence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defensive revisionism and sphere-of-influence politics. It argues that the Donroe Doctrine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erosion of U.S. relative advantages, domestic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an exclusionary conception of securit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rather than simply as an expression of confident hegemonic expansion. The central paradox of the Donroe Doctrine lies in the fact that,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seeks to delay hegemonic decline by restoring its capacity for regional control, such efforts may simultaneously erode the legitimacy of the rules-based order on which U.S. leadership has long depended and encourag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evolve in a more exclusionary, hierarchical, and fragmented direc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onroe Doctrine on the basis of actual policy developments and policy data. The Donroe Doctrine reflects a growing

tendency toward power-politics logic in U.S. policy toward the Western Hemisphere. Whether this tendency will ultimately produce a broader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order, however, will depend on the responses of other major powers, the attitudes of U.S. allies, and the constraining capacity of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Monroe Doctrine; Hegemonic Expansion; Donroe Doctrine; Revisionism